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导论

石 仲 泉

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文献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概要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与其他单位合作编辑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的关于毛泽东哲学著作的一部专集。它从一个侧面记载了毛泽东从30年代到60年代，特别是延安时期的一些哲学思考，对于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文献价值，现将这本书的一些情况和内容作一简要介绍。

一、毛泽东读哲学书籍的批注情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入了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和建国以后研读10本哲学书籍写的批注、1篇读书摘录和1篇读书日记。

毛泽东读10本书的批注，有8本是在延安时期批注的，两本是建国以后的。毛泽东批注各书的时间，有的有明确记载，有的只能根据批注的内容或批读的版本作出推测，有的还无法推测出具体时间，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毛泽东研读10本书的批注，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有5本批注，是比较重要的。从批注篇幅看，这5本批注占《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全书批注文字的97%；从批注内容看，它集中了读书批注的主要哲学观点，是全书的主体和精华所在。

纲》。《哲学选辑》全书有37万多字，毛泽东批读了3遍，分别用黑铅笔、毛笔和红蓝铅笔批划。毛泽东的批注文字除集中在“绪论”的第一节和第一章的第三节外，主要集中在艾思奇写的《研究提纲》部分，它占全书批注文字（约为3200字）的2/3。

（五）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以下简称“教程”第4版）的批注情况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同第3版的内容一样，准确地说是第4次印刷。在延安，毛泽东读“教程”的遍数，同已读的苏联其他哲学教科书比，可能是最多的。这次似为重点批读。毛泽东研读全书写的批注文字约为1200字，其中2/3集中在该书最后一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毛泽东批读这本书没有留下批注时间，从批注内容分析，大体在1941年3月以后至9月前后。

这里附带说一下，当时的延安理论书籍奇缺，毛泽东读过的这几本书，除《哲学选辑》外，其余4本书上都有其他人的批划笔迹和批注文字，说明这些书并没有被完全看成是毛泽东个人的，大家可以辗转借读。就毛泽东读这些书而言，批读一遍者少；批读一遍以上者多。仅此也说明毛泽东当时是在发愤读书，刻苦钻研理论。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另外5本读书批注的情况是这样：

（一）读艾思奇著《思想方法论》的批注

《思想方法论》于1937年1月出版。毛泽东只在这本书中的一页上写有约40字的批注文字。批读这本书的具体时间

无法考证。目前没有注明读该书的批注时间。

(二) 读河上肇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批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是李达等翻译后，于1930年6月初版，11月再版的。毛泽东批读这本书没有留下具体时间，考证起来也有一定困难，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没有注明时间。根据批注内容仅可推测毛泽东读这本书在抗战爆发之后是无疑的。

(三) 读博古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批注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第四章第二节，1938年9月12日发表于《真理报》。博古是根据《真理报》所载原文翻译的，当时没有署名斯大林著，但不久出版的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即将该文收入。博古译本于1938年12月出版。该书出版后，博古赠送一本给了毛泽东，并在书的扉页上题字：“泽东同志惠存，博古”。毛泽东即是在这本书上写的批注，时间当在这之后不久。因为1939年5月出版的《哲学选辑》收入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即是博古的这个译本。在“选辑”中，只是将个别译名作了改动（如昂格斯改译为恩格斯），其他无变化。毛泽东对“选辑”中博古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批划不多，只用黑铅笔批划了为数不多的直杠、浪线等符号，没有写下任何批注文字。这种情况，一方面可能反映了毛泽东对这本书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博古送他书后即已看过。在博古送他的书上，批划较多。全书52页（22000多字），毛泽东几乎在每页上都划有直杠、浪

线等符号，也有不少问号，并写有200多字的提要性和疑问性的批注文字。既然已批读过一遍，按照一般的读书习惯，第二遍再读时没有新的想法，批注会少些，由此反过来推论，毛泽东读博古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批注，可能在1938年12月以后不久。

（四）读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的批注
任著《中国哲学史》于1964年10月出版。毛泽东读这本书的第五章第一节，对该书关于华严宗的分析写了近百字的批注。该书认为，一方面，华严宗承认个别与一般的内在联系，“总算有一点辩证法观点”；另一方面，华严宗又唯心主义地夸大、吹胀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把“联系”（缘）绝对化，甚至抹煞“个别”的存在。毛泽东在这句话旁批道：“何其正确”。毛泽东还写了一段较长的批语，论述相对与绝对的辩证关系，批评书中的某些分析离开了客观辩证法，与书中引述的列宁的观点相矛盾。毛泽东写的这些批注没有留下时间。

（五）读李达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内部讨论稿上册，唯物辩证法）的批注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原本即是《社会学大纲》。毛泽东与李达在1961年夏天相会在庐山，提议李达找几个助手，将30年前的《社会学大纲》修改后重新出版。经过5年努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出版了内部讨论稿，毛泽东即在内部讨论稿上写了近300字的批注，具体时间也不详。毛泽东写的较长的一条批注是关于唯物辩证法体系的，另一条批语是针对书中根据斯大林的观点讲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

的。李达认为两种发展观对立的第一点是“孤立观点和联系观点的对立”。毛泽东对此批道：“不必抄斯大林”，联系到他在延安时期对博古译斯大林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批注情况，看来他对斯大林的哲学体系和哲学观点是有一定保留的。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的一篇读书摘录，即1937年9月读艾思奇著《哲学与生活》一书所写的3000字摘录。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毛泽东唯一的读哲学书籍的摘录。这个摘录如他在1937年致艾思奇的信中所说，还对原书中的一个问题提出了质疑，即写了200多字的评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与他的某些摘录性的批注又很相通。因此，这个摘录又不单纯是“抄录”，实际上是摘录形式的批注。在这个摘录后还附有1937年毛泽东就此给艾思奇的上述致函。这两件，连同上述毛泽东读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批注，尽管分别在一些出版物，包括毛泽东的著作和书信集中发表过，但为了便于对毛泽东的哲学批注展开系统研究，《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将其重新发表还是有益的。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收入的《读书日记》，是1938年2月1日至4月1日的日记。这也是保存下来的毛泽东的唯一的读书日记，尽管只记了2个月，但它却记载了毛泽东读李达《社会学大纲》、读潘梓年《逻辑与逻辑学》和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3本书的读书时期和读书进度。读《社会学大纲》的批注时间，就是根据这个《读书日记》确定的。因此，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将其作为读《社会学大纲》批注的附录发表。

这样，《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一共有13件材料。这13件大多是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珍贵文献。毛泽东读10本书写的批注文字约为23000字，再加上3000字摘录和近千字日记，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属于毛泽东的文字总共约为27000字。

二、毛泽东读书批注的特点

毛泽东读10本书23000字的批注，有这样几个显著特点：

（一）联系中国社会历史的革命斗争写批注

这个特点在几本主要的读书批注中是比较显著的。因为毛泽东在延安如饥似渴地研读这些哲学书籍，并不由于他有“哲学癖”，尽管他在早期求学阶段，对哲学问题已有浓厚兴趣，例如在读德国泡尔生著《伦理学原理》时写的批注已在探求宇宙之“大本大源”。前已指出，当时延安理论书籍异常短缺，毛泽东到处借书读，并拜托在国统区工作的同志买书读，根本目的在于他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武装自己，提高思想理论水平，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矢”来射中国革命之“的”。

我们党登上中国革命政治舞台之时，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准备是很不够的。我们党的早期的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在国内从事革命斗争的，还是留学日本、苏联和欧洲的，所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很有限。（王明之流将马列主义理论生吞活剥，用来唬人，不是以科学态度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另当别论）。就毛泽东来说，1920年读了马

（二）注意对党内错误路线、错误思想的批判

中国革命斗争经历了较大的曲折。在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是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又发生了“立三路线”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特别是王明路线在党内统治达4年之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遵义会议虽然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纠正了错误的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但是由于战争环境，没有来得及清算“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路线，批判他们的各种错误观点。毛泽东批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联系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继续遵义会议以后没有进行的工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在50年代初发表时的题解曾经写道，毛泽东写作“两论”的目的，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样的主观主义错误而写的。从毛泽东的读书批注看，印证了这一点。在毛泽东读“教程”第3版和第4版两本书的批注以及读《哲学选辑》的批注中，批判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特别是王明的文字占有一定的比重。批注对王明没有点名，因为在1942年全党整风以前，他还处在党的领导岗位上，但批注中所讲的“中国主观主义”、“中国教条主义”，实际上是指王明的。毛泽东批评他们错误的批注文字，虽然不到千字，但是散见多处，十分显眼，而且有些用语的分量也不轻，毛泽东研读这些书籍及其写的这些批注，对他个人来说，为后来进

行整风斗争，批判王明等人的错误，起了一定的理论准备作用。

（三）对原著的论述和观点有重要的概括和发挥

毛泽东写的批注文字，对原著的评论是少量的，在2万多批注文字中不过数百字，对原书内容的提要是大量的，在全部批注文字中约占1/3；批注文字最多的还是对原著的论述和观点的发挥，在发挥中，毛泽东或通过对原著观点加以引申，或通过对原著的观点提出批评，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观点，这类批注在万字以上。这是《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最闪光的部分，也是其理论精粹之所在。从对毛泽东读几本书的批注文字加以比较看，按批注时间顺序排列，在早批注的本子中，提要性的文字所占比重很大，例如在读“教程”第3版、米丁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上册）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的批注中，提要性批注文字很显著。但是在1939年以后的读书批注中，提要性的批注文字大为减少，理论发挥性的文字更为突出。这说明毛泽东的哲学修养在不断提高，自己的哲学观点越来越多。特别是读《哲学选辑》的批注，毛泽东无论在哲学体系，还是在认识论和辩证法方面，都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哲学观点，再联系到这年2月他致陈伯达、张闻天的3封信中发表的哲学观点，那末在1939年这一年，他的哲学理论水平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说，这是在1937年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之后，他的哲学思想大发展的一年。这年1月，他致何干之说，要“作工具的研究”并“以哲学为主”。他对《哲学选辑》的批注及他致陈、张的信表明，他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之果。

时，认为德波林的唯心论表现出形式主义即形而上学，向着理性的唯心论、黑格尔主义倒退。毛泽东在1941年3月以后批读这本书时，在上述观点旁批注道：“唯心辩证（黑格尔），唯心形式（德波林及中国德波林派），唯物形式（法国启蒙者，陈独秀），唯物辩证，四者之中，只有最后一种是正确的。”这条批语，就其把德波林派列为“唯心形式”，即形而上学唯心论来看，是对书中蕴含之意的概括，但就其提出四个哲学派别而言，是比较独特的见解。据说，50年代苏联哲学家提出过这样的看法，与毛泽东不谋而合，但这个见解没能得到公认。这种分类标准可能有某种不准确性，但对于研究哲学家们的某些特点不是没有参考意义的。

（二）关于认识过程的阶段

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认为，认识过程包括由物质到感觉和由感觉到思维的发展过程，分析这个过程，“第一要阐明由物质到意识的推移的辩证法，第二要阐明由感觉到思维的推移的辩证法”。毛泽东对此批注道：“第三要阐明由思维到物质的推移的辩证法，即检验与再认识”。李达在另一处分析认识过程的两阶段时，毛泽东也写了批语：“还有，由思维到物质”。这两条批语，对李达的观点作了重要补充，也是对包括苏联哲学教科书在内的传统观点的发展。

其实，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已阐述了认识运动的全过程，不仅实际上把认识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而且特别强调第三阶段“由思维到物质的推移的辩证法”的作用。这两段批语对认识过程所作的分解，把《实践论》的观点进一步明确化了，认为认识过程是两个飞跃、三个阶段。

(三) 关于普遍与个别的关系

毛泽东在1941年研读“教程”第4版的批注中，一方面批评王明教条主义割裂一般与特殊、普遍与个别的关系的错误，另一方面又对这两者在认识论上的辩证关系作了发挥，指出：“在认识过程，个别决定普遍；在实践过程，普遍决定个别”。毛泽东还以战争为例说：“在认识过程，战术决定战略；在实践过程，战略决定战术。”

这里的认识过程，是指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过程中，只有通过无数“个别”的抽象才能产生“普遍”，这是讲的认识的唯物论。所谓“在实践过程，普遍决定个别”，是就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言的。这是讲的认识的辩证法。但是，批注的表述有两个缺点，一是有割裂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的嫌疑，二是把实践过程的“决定”同认识过程的“决定”等量齐观，不妥。因为实践过程的“决定”是有条件的，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说，普遍决定个别。

批注的这个缺点，后来在公开出版的《矛盾论》中加写的关于人类认识的“两个循环”中得到了纠正。《矛盾论》指出：人类认识是由特殊到一般和由一般到特殊这样两个过程循环往复地进行的，每一次循环都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而教条主义者不懂得人类认识这两个过程的相互联结，把一般真理变成为人们所不能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从思路看，这里的两个循环和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与上述批注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这里的表述修正了上述两个“决定”的缺点，对认识运动的概括比较全面和准确。

(四) 关于辩证法三大规律的关系

苏联的几本哲学教科书论述三大规律的顺序和观点有所不同，有的还指出了其他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之“具体化”，但是没有展开明确地阐述三大规律的内在关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比苏联教科书前进了一大步，明确认为，在三大规律中，对立统一规律是最根本的规律，“包摄着”其余诸规律的范畴，其余诸规律和范畴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形态。毛泽东很重视这个观点。这与《矛盾论》讲的“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是一致的，但是《矛盾论》没有展开。建国以后，毛泽东发挥了这个观点，比李达讲的更明确。1965年，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出版后，他在批注中写道：“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这条批注近300字，概括了他近30年凝聚的思想。

(五) 关于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的转化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讲对立统一规律时，根据列宁的思想列出一节“矛盾之主导的方面的意义”，举例说明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导方面的决定作用，没有在理论上展开分析。毛泽东对这个思想很感兴趣，写了整个批注集中最长的一条批注，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阐发了这个观点，并且提出了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的转化、矛盾的主要方面与

非主要方面转化的思想。这就发展了“教程”的观点，也把辩证法的互相转化的思想贯彻到底了，即只要有矛盾，就没有不转化的，不存在不转化的矛盾。《矛盾论》吸收了这条批注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理论阐述，使之成为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六）关于斗争的绝对性与统一的相对性

《矛盾论》有专节阐述这个思想，其阐述的角度比较多地是从运动的相对静止（量变）状态和显著变动（质变）状态的关系上进行分析的，认为矛盾的斗争存在于这两种状态中，并经过质变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因而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这些分析，包括同一的条件性和斗争的无条件性的分析，都是正确的，但又不很充分的，它没有完全消除人们的疑问：为什么不能说两者同时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毛泽东对艾思奇《研究提纲》的批注，分析了这个问题，指出：“具体的斗争形态也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说斗争无条件，是指矛盾的普遍性、永久性，不是说具体的矛盾。”这就进一步明确了斗争的绝对性的含义，也就是说，斗争的绝对性不是讲的某一具体矛盾，某一具体的斗争形态。若就某一具体矛盾而言，其斗争性也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其统一性也能成为绝对的。毛泽东继续指出：“统一即事物的暂时安定。事物的安定在暂时是绝对的，在永久是相对的”，“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论占统治地位。”这几条批注说明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在一定条件下是能互相转化的，在不同的状态下，矛盾的统一性或斗争性

都能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因而，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的关系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这是对《矛盾论》的重要补充。

（七）关于中庸思想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1939年2月，他在致陈伯达、张闻天的信中把中庸思想视之为开展两条战线斗争的重要的思想方法，指出：“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还说：所谓“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的顽固，是右倾，是‘不及’”。他还指出：孔子的中庸观念虽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①大约半年以后，毛泽东研读《哲学选辑》，对中庸思想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艾思奇《研究提纲》认为，中庸思想不是折衷主义，说折衷主义，是对它的曲解，其精华是辩证法。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观点，在批注中指出：“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5—147页。

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不是‘被曲解’，它本来是这样的”。还指出：“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他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他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如同形式论理之同一律，只是辩证法一要素一样而不是辩证法。”

毛泽东的认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怎样看待这个变化？1939年2月的思想与5月的思想是否完全对立？后面文章有专门论述，这里就不赘述。在批注里，毛泽东对中庸思想还作了进一步分析，认为它有两种表现形态：“当其肯定质的绝对安定性”时，是“死硬派思想”；“当其畏首畏尾于过程正反之间”，“代表两端间的过渡形态时”，则是“折衷派思想”。这是关于中庸思想的一个新见解。毛泽东关于中庸思想的这些看法，有助于中国哲学史和政治思想史对它进行再认识。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的内容很多，通观批注，不难看出，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哲学思想是十分活跃的。尽管他写的批注，有些还不成熟，有的表述也不严密和准确，但它却使人们了解到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这对于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十分重要的。

对毛泽东读《辩证法唯物论 教程》（中译本第3版）和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上册）的批注初探

1937年7、8月间，毛泽东在延安抗大发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讲演之前，读过一批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中译本，并写下了大量批注文字。收录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的毛泽东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的批注和读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的批注（以下简称“两本批注”），是研究《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与苏联哲学关系的最直接的原始文献资料。本文拟从“两本批注”这个视角，就“两论”与苏联哲学的关系谈点粗浅看法。^①

^① 从“两论”内容看，毛泽东似还批读了艾思奇、郑易里译米丁等著《新哲学大纲》（1936年6月出版），但迄今未发现毛泽东读过的该书及其批注。

一、毛泽东批注两本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情况

西洛可夫、爱森堡是30年代的苏联哲学家。^①《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以下简称“西氏本”)是以他们两人为首的6名哲学家集体编著而成的。这是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学派之后写作较早、影响较大的一本书。在苏联出版后第2年,日本学者即译成日文于1932年3月在日本出版。雄岛定吉、直井武夫在“译者例言”中说:“本书是至今对辩证法唯物论作了系统说明的唯一著作。”1932年9月,中国学者李达、雷仲坚通过日译本转译成中文,^②以笔耕堂书店名义出版,到1935年6月,印行了第3版。李达在“译者例言”中称,这本书是苏联“最近哲学大论战的总清算,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现阶段,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系统说明”,因而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重视。

毛泽东是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读到这本书的。当时的延安,书籍很缺。许多书在人们中间是互相传看、辗转批读的。这本书就是典型的一例。这本书是竖排的,书上的批划和批注也是竖写的。在这本书上有几种不同的批划和批注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理论组曾多方查找这两位作者的生平,未获多少结果。据武汉大学陶德麟同志来信说:《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苏联共产主义学院列宁格勒分院哲学研究所编的,西洛可夫可能是该所所长。本书6位作者都是批判德波林的积极分子,时称“少壮派哲学家”。

② 据陶德麟同志来信说:李达生前对他和其他助手曾偶然谈到雷仲坚,说是他(指李达)的学生。陶德麟还告诉说,李达懂日文、英文、德文,不懂俄文。